

政企关系重构、政企信息不对称 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于文超¹, 王小丹²

(1.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重庆 401120; 2.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在政府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企业在预测市场运行态势和政策变动趋势方面处于信息劣势,由此引发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人事变更会重塑地方政商格局,导致原有政企沟通机制失效,由此带来的政企关系重构会加剧政企信息不对称。基于2012年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立足于考察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对于大企业而言更弱。机制检验表明,随着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提升,政企关系重构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将减弱,而政府干预未能对政企关系重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制度成因提供了新证据,更为完善企业营商环境、夯实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的微观基础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 政企关系重构; 企业产能利用率; 政企信息不对称; 政府信息公开; 营商环境; 政府人事变更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20)02-0131-12

DOI:10.13269/j.cnki.ier.2020.02.010

一、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对于化解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风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积极意义。现阶段,探寻有效的产能过剩治理路径已成为理论界和决策层关心的热点问题,而从微观视角考察中国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是回应上述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产能过剩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其决定因素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因素解释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一方面,关注市场因素的文献中,学者们将产能过剩现象视为企业构建市场进入壁垒、应对市场需求波动的“策略性行为”抑或产能调整成本过高导致的“被动选择”^[1-3]。林毅夫等^[4-5]学者立足中国所处发展阶段,通过“潮涌现象”解释中国产能过剩现象的独特成因,强调产能过剩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因素的研究指出,在地方竞争格局和官员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会压低辖区内企业获取关键性资源的成本,对辖区内企业

收稿日期: 2019-10-26; 修回日期: 2020-02-10

作者简介: 于文超(1987—),男,山东安丘人,经济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转型与发展;王小丹(1996—),女,重庆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JL05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3194);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6QNJJ11);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KJQN201800310);西南政法大学校级重点课题(2018XZZD-12);西南政法大学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专项课题(2020)

进行“竞争性补贴”扭曲企业正常的产能投资决策机制,导致企业产能过度扩张^[6-12]。除此之外,近年来,一些文献尝试跳出对市场和政府两类因素的争论,从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分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成因,具体观点包括:竞争性行业市场化改革滞后与产能管制政策的共同作用^[13]、商品市场“饱和需求陷阱”和住房市场“投资偏好陷阱”的叠加效应^[14]、地方政府项目招商过程中收益-贡献不对称^[15]等。

现有文献为我们了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成因和治理路径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但值得强调的是,这些研究忽视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是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成因。在现实经济中,政府能够全面掌握经济运行态势,对未来经济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做出预期和评估,在政策调整和执行过程中拥有主动权,加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化和主动性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16],因此,企业在获取市场信息、预测政策变动趋势和执行效率方面处于信息劣势^①。在这种背景下,企业难以有效应对市场供需变化和政府政策变动,难以根据市场冲击和政策冲击及时调整潜在产能,进而带来产能过剩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政企信息不对称从理论上易于理解,但准确的实证测度却存在一定困难,而地方政府人事变更引发的政企关系重构,为我们评估政企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济后果提供了重要契机。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地方政府人事变更带来的发展理念差异容易导致原有经济政策的变动和不确定性^[20];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人事变更往往改变了地方权力结构,重建政商格局,使原有的政企关系网络失效,导致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构建成熟、顺畅的政企沟通机制以及彼此间的信任^[21]。

本文利用地方政府人事变更信息构建政企关系重构指数,从经验上评估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政企关系重构会显著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但这一效应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更弱。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随着企业信息化水平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提高,政企关系重构的上述负面影响会减弱,而政府干预并未影响政企关系重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与本文比较接近的研究包括:张龙鹏和蒋为^[22]从静态角度证实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助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但并未检验这一效应背后的理论机制;徐业坤和马光源^[12]基于政府干预视角强调,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绩压力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相比之下,本研究通过政企关系的动态变化,关注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而为全面评价政企关系的经济效应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拓展了政企关系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框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视角,然而,现有文献较多考察政企关系的资源配置效应或产权保护效应,忽视了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视角评估政企关系产生的经济效应。本文利用地方政府人事变更对地方政企关系的“外生冲击”,证实了政企关系重构引发的政企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为我们理解稳定、可预期政企关系的积极意义提供了转型背景下的新证据。第二,提供了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政策借鉴。产能过剩是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痼疾,而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微观基础。区别于已有文献从政府干预或市场失灵角度展开研究,本文强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企业产能过剩的重要成因,这为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保持政策一致性和连续性,持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稳定、有效、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是减少政企信息不对称的重要路径。这为当前阶段提升企业产能利用效率、夯实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的微观基础提供了政策启示。

文章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数据来源、方程设定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主要实证结果,从经验上评估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第五部分是拓展性研究,包括影响机制检验、竞争性机制检验、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理论机制分析

总体而言,政企关系重构引发的政企信息不对称将通过如下两种机制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

第一,政企关系重构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应对市场冲击。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能凭借强势的

资源配置能力更全面地掌握行业信息,预测市场环境变化^[5 22]在政企互动中占据信息优势;相比之下,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企业难以完全掌握行业信息,容易形成对未来市场前景的误判,尤其是对有前景行业的投资共识将引发“潮涌现象”,导致行业产能过剩^[5]。因此,市场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成为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关键。稳定、顺畅的政企沟通机制能减少政企信息不对称,将政府掌握的市场环境信息传递给企业,使企业在投资项目实施之前,准确了解市场环境,在投资项目实施之后,有效应对市场冲击,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决策效率,化解产能过剩风险^[23]。然而,政企关系重构会导致原有政企沟通机制失效,加剧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无法获得政府掌握的优势信息,难以在事前准确了解市场环境以及在事后有效应对市场冲击,从而降低了投资效率,引发产能过剩问题。

第二,政企关系重构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应对政策冲击。地方政府应对外部经济波动、推动辖区内产业升级的施政努力以及地方政府人事变更都会引发政策调整,导致政策不一致和不连续,因此,各类市场主体可能会面临政策冲击。当原有产业扶持政策调整时,地方政府之前的优惠政策承诺可能无法兑现,部分企业此前受利好政策刺激的产能扩张行为,可能使企业面临市场需求减少带来的库存和现金流压力,产能过剩问题将凸显。当新产业政策实施时,政府出台的政策优惠措施会降低行业进入门槛和产能投资成本,导致企业对市场前景盲目乐观和产能过度扩张^[17 24]。另外,在地方政府人事变更背景下,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等公共治理目标,还会通过税收、银行贷款等经济资源的配置影响和干预企业行为,导致企业过度扩张产能和重复建设^[12]。良好的政企沟通机制能减少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有效了解政府意图和市场环境,准确预知政策变动,减少政府对企业决策的不当干预,构建更稳定的企业经营环境,最终提高企业产能投资决策效率。然而,政企关系重构会弱化政企沟通机制的有效性,加剧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将导致企业面临较强的政策不确定性,无法根据政策非预期变动调整产能投资策略,尤其是在政府干预导致生产性资源价格扭曲的情况下,企业会忽视市场实际需求,盲目扩张产能,进而引发产能过剩风险。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说:

假说 1: 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向影响可能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而不同。大型企业有着较强的市场信息搜集分析能力,能够有效抵御市场风险和冲击,且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关注,能通过多元化的政企沟通机制了解政府意图,面临的政策非预期变动相对更少。同时,政企关系重构对大型企业与政府之间沟通机制的冲击较弱,因为新一届地方政府为稳定辖区内投资、税收和就业,往往在地方政府人事变更之后“抓大放小”,主动调研、走访大型企业,帮助大型企业排忧解难,从这一视角而言,政企关系重构不会削弱大型企业应对市场冲击和政策冲击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小型企业既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搜集能力,也难以应对市场风险,且缺乏稳定、通畅的政企沟通机制,政策非预期变动更容易对企业产能投资决策带来困扰。同时,中小企业面临地方政府人事变更导致的政企关系重构时,难以在短期内构建稳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中小企业应对市场冲击和政策冲击的能力,降低中小企业的产能投资效率。

但不容忽视的是,市场冲击和政策冲击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产能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可能有明显差异。中小型企业投资决策更加灵活,拥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即便面临较强的市场冲击和政策冲击,也能及时调整产能投资方向和产品结构,提高产能利用效率。比较而言,大型企业产能投资计划一旦实施,其调整将面临较高的“沉没成本”,当面临非预期的市场冲击和政策冲击时,大型企业的产能投资决策难以及时调整,加之大型企业往往面临着“政策性负担”,即使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出于稳定投资和就业的需要,也无法灵活缩减潜在产能规模,从而加剧产能过剩风险。因此,若政企关系重构会增加企业面临市场冲击和政策冲击的风险,这一效应对大型企业而言会更强。

根据上述两个角度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相对应的假说:

假说 2a: 相比于中小型企业, 政企关系重构对大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更弱。

假说 2b: 相比于中小型企业, 政企关系重构对大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2012 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25 个城市开展的企业调查。该调查涵盖 2 848 家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 调查内容涉及企业基本信息、销售与供应、创新与科技、股权结构、竞争环境、基础设施与服务等。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企业产能利用率问题, 在后文实证分析中主要使用制造业企业样本, 共 1 727 家。由于一些受访企业的关键指标缺失, 后文基准回归仅用到 1 175 家企业。总体而言, 此次调查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择受访企业, 并通过电话回访对部分企业信息进行确认, 调查所得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因此是研究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经营决策的典型微观数据。另外, 地方主政官员(市委书记、市长)更替数据来自笔者对网络资料、地方年鉴的汇总整理, 城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 回归方程

本文主要利用方程(1)实证评估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utirate_i | utilevel_i = \beta_0 + \beta_1 gerr_c + \lambda FV_i + \chi CV_i + \varepsilon_i \quad (1)$$

方程左侧的被解释变量 *utirate* 代表企业产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 等于企业实际产出与企业动用全部资源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之比, 其取值越大说明受访企业产能过剩现象越不明显。由于企业产能利用率 *utirate* 是取值介于 0 到 100 之间的受限变量, 本文采用 Tobit 模型对其进行估计, 并关注 Tobit 模型的边际效应系数。考虑到企业在回答企业产能利用率相关问题时可能存在主观误差, 我们将企业产能利用率五等分, 并赋值新变量 *utilevel*, 取值为 0 到 4 之间的离散整数, 相应地, 我们使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对其进行估计。方程右侧的解释变量 *gerr* 代表城市的政企关系重构程度, 使用地方官员更替频率衡量, 具体等于企业调查年份前置五年(2006—2010 年)市委书记更替次数(*gtfre_sj*)与市长更替次数(*gtfre_sz*)之和除以 5^②, 这一指标构建思路在已有文献中得到普遍应用^[25-26]。

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 本文还参照干春晖等^[7]的研究, 在方程(1)中加入可能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相关变量。其中: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FV* 包括: 企业信息化水平 *itindex* 表示信息沟通技术在企业维系客户和合作伙伴关系、改善产品和服务、营销和销售等方面的重要性^③; 企业研发活动 *rdact*, 若受访企业过去三年独立开展研发活动或者与其他企业合作开展研发活动, *rdact* 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④; 政府持股比例 *govshare*, 表示企业股权结构中政府持股的比重; 集团下属企业 *firmpart*, 若受访企业属于大型企业集团的一部分, *firmpart* 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出口企业 *export*, 若受访企业有出口活动发生, *export* 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资本密集度 *fixasset*, 使用受访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加 1, 然后取自然对数衡量^⑤; 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edupro*, 使用企业中完成中等学历的员工比重衡量; 企业年龄 *age*, 使用企业成立年限衡量; 企业规模 *size*, 用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测度。同时,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还包括企业所处的行业虚拟变量。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CV* 包括: 直辖市或省会城市 *capital*, 若样本企业所在城市为直辖市或省会城市, *capital* 赋值为 1, 否则 *capital* 赋值为 0; 城市经济增长 *gdpgro*, 使用城市 GDP 增长率衡量; 城市产业结构 *struc*, 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衡量; 城市财政盈余水平 *surplus*, 使用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差除以财政收入衡量。为减弱内生性问题, 变量 *gdpgro*、*struc*、*surplus* 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ε 代表随机误差项。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基准样本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 *utirate* 的平均值为 86.98%, 这说明样

本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86.98% ,部分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现象。政企关系重构 *gerr* 的平均值为 0.400 0 ,表示 2006—2010 年间 25 个样本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更替次数均值为两次。企业信息化水平的平均值、中位数分别为 3.239 1、3.400 0 ,说明信息沟通技术在企业经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变量 *rdact*、*firmpart*、*export* 的均值分别为 0.419 6、0.107 2、0.215 3 ,表明有 41.96% 的样本企业过去三年开展了研发活动 ,10.72% 的样本企业为集团下属企业 ,21.53% 的样本企业为出口企业。变量 *edupro*、*age* 的平均值分别为 48.744 7、13.228 9 ,这意味着 ,平均而言 ,受访企业中完成中等学历的员工占比 49% 左右 ,企业成立年限为 13 年左右。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中文名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utirate</i>	产能利用率(%)	1 175	86.984 7	90.000 0	10.320 7	7.000 0	100.000 0
<i>utilevel</i>	产能利用率	1 175	3.715 7	4.000 0	0.565 2	0.000 0	4.000 0
<i>itindex</i>	企业信息化水平	1 175	3.239 1	3.400 0	1.217 2	1.000 0	5.000 0
<i>rdact</i>	企业研发活动	1 175	0.419 6	0.000 0	0.493 7	0.000 0	1.000 0
<i>govshare</i>	政府持股比例	1 175	5.964 3	0.000 0	22.286 5	0.000 0	100.000 0
<i>firmpart</i>	集团下属企业	1 175	0.107 2	0.000 0	0.309 5	0.000 0	1.000 0
<i>export</i>	出口企业	1 175	0.215 3	0.000 0	0.411 2	0.000 0	1.000 0
<i>fixasset</i>	资本密集度	1 175	11.201 4	11.389 3	1.570 3	0.000 0	19.584 1
<i>edupro</i>	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1 175	48.744 7	40.000 0	27.642 0	0.000 0	100.000 0
<i>age</i>	企业年龄	1 175	13.228 9	11.000 0	8.595 4	1.000 0	125.000 0
<i>size</i>	企业规模	1 175	4.449 5	4.382 0	1.334 2	1.609 4	10.308 9
<i>gerr</i>	政企关系重构	25	0.400 0	0.400 0	0.251 7	0.000 0	0.800 0
<i>capital</i>	直辖市或省会城市	25	0.400 0	0.000 0	0.500 0	0.000 0	1.000 0
<i>gdpgro</i>	城市 GDP 增长率	25	13.064 8	13.060 0	1.635 4	10.300 0	17.500 0
<i>struc</i>	城市产业结构	25	45.793 2	44.370 0	9.748 3	31.740 0	75.110 0
<i>surplus</i>	城市财政盈余水平	25	-0.233 3	-0.154 4	0.239 9	-0.865 0	0.083 2

表 2 报告了 25 个样本城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分布情况。在样本城市中 ,广州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均值最低 ,为 72.98% ,东莞市次之 ,其企业产能利用率均值为 80.01% ,而烟台、宁波、济南、北京、青岛等城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均值也较低 ,分别为 81.49%、82.57%、82.80%、83.28%、84.70% ,均低于 85%。相比之下 ,武汉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均值最高 ,为 92.66% ,南京市次之 ,其企业产能利用率均值为 91.69% ,而郑州、南通、洛阳、成都等城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均值也较高 ,分别为 91.14%、91.00%、90.74%、90.60% ,都超过 90%。从中位数上看 ,郑州、南京、武汉三个城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中位数最高 ,分别为 95%、95%、93% ,而广州、东莞、宁波三个城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中位数最低 ,仅为 80%。

表 2 不同城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分布情况

单位: %					
城市	均值	中位数	城市	均值	中位数
合肥	89.11	90	苏州	88.93	90
北京	83.28	90	南通	91.00	90
广州	72.98	80	沈阳	85.07	85
深圳	88.90	90	大连	84.20	85
佛山	86.30	87	济南	82.80	90
东莞	80.01	80	青岛	84.70	85
石家庄	88.62	90	烟台	81.49	85
唐山	89.17	90	上海	89.80	90
郑州	91.14	95	成都	90.60	90
洛阳	90.74	90	杭州	89.31	90
武汉	92.66	93	宁波	82.57	80
南京	91.69	95	温州	87.26	90
无锡	88.90	90			

本文还关注了基准样本中主要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⑥。结果表明 ,变量 *gerr* 与 *utirate*、*utilevel* 的相关系数都显著为负 ,初步证实政企关系重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负向关系。控制变量中 ,变量 *itindex*、*fixasset*、*age*、*size*、*gdpgro* 与 *utirate* (*utilevel*) 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 ,而变量 *govshare* 与 *utirate* (*utilevel*) 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 ,这初步说明 ,企业信息化水平、资本密集度、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城市 GDP 增长率等因素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显著正相关 ,而政府持股比例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然而 ,上述结论仅通过相关性分析获得 ,更加准确的结论依然需要多元线性方程的回归分析。另外 ,绝大

部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 0.3 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对后文回归分析带来太大干扰。

四、主要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考察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表 3 第(1)列的 Tobit 模型边际效应系数显示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变量 *gerr*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企关系重构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我们进一步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表 3 第(2)列结果表明,政企关系重构依然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继续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变量,表 3 第(3)列结果显示政企关系重构 *gerr*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以第(3)列结果为例,平均而言,政企关系重构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251 7),企业产能利用率会降低约 1 个百分点。上述结果说明假说 1 成立。

表 3 政企关系重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基准回归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utirate</i> : Tobit 边际				被解释变量 <i>utilevel</i> : Ordered Probit			
	(1)	(2)	(3)	(4)	(5)	(6)	(7)	(8)
<i>gerr</i>	-1.987 1*** (0.757 4)	-3.464 6*** (0.882 0)	-3.932 3*** (1.051 1)	-4.563 1*** (0.958 5)	-0.275 2** (0.116 0)	-0.483 4*** (0.131 0)	-0.642 1*** (0.163 2)	-0.660 1*** (0.145 0)
<i>itindex</i>			0.564 8** (0.258 8)	0.914 7*** (0.234 3)			0.100 1*** (0.038 4)	0.129 9*** (0.032 5)
<i>rdact</i>			-0.167 0 (0.691 6)	-0.426 6 (0.556 0)			-0.139 0 (0.094 8)	-0.131 7* (0.077 0)
<i>govshare</i>			-0.023 8* (0.012 6)	-0.019 3* (0.011 6)			-0.003 5* (0.001 8)	-0.003 1* (0.001 6)
<i>firmpart</i>			-0.543 6 (0.797 0)	-0.127 7 (0.816 5)			-0.006 7 (0.132 7)	0.004 1 (0.114 6)
<i>export</i>			0.555 7 (0.632 7)	0.576 1 (0.595 9)			0.035 0 (0.102 0)	0.090 7 (0.091 2)
<i>fixasset</i>			0.531 9*** (0.190 4)				0.062 2** (0.026 5)	
<i>edupro</i>			0.006 8 (0.011 5)	-0.006 0 (0.010 4)			-0.000 2 (0.001 6)	-0.001 1 (0.001 3)
<i>age</i>			0.037 1 (0.025 9)	0.043 1* (0.024 2)			0.007 0 (0.004 8)	0.005 9 (0.004 1)
<i>size</i>			0.521 6** (0.254 7)	0.382 7* (0.202 3)			0.057 6 (0.036 3)	0.042 1 (0.029 6)
<i>capital</i>		1.523 2** (0.674 5)	2.042 9** (0.841 1)	1.987 1*** (0.706 1)		0.224 6*** (0.084 2)	0.280 6** (0.114 4)	0.274 9*** (0.089 6)
<i>gdpgro</i>		0.014 4 (0.198 9)	-0.076 5 (0.241 7)	-0.068 7 (0.206 8)		0.011 2 (0.026 8)	0.006 3 (0.035 1)	0.005 1 (0.028 8)
<i>struc</i>		-0.136 0*** (0.044 6)	-0.030 8 (0.062 4)	-0.142 0*** (0.047 9)		-0.017 3*** (0.004 6)	-0.001 8 (0.007 8)	-0.016 8*** (0.005 1)
<i>surplus</i>		-2.626 7*** (0.943 6)	-2.196 8* (1.197 4)	-2.617 2*** (0.995 9)		-0.356 6** (0.142 5)	-0.491 6** (0.194 8)	-0.400 2*** (0.153 2)
行业	No	No	Yes	Yes	No	No	Yes	Yes
观测值	1 690	1 690	1 175	1 555	1 690	1 690	1 175	1 555
Pseudo R ²	0.000 4	0.003 7	0.009 1	0.008 7	0.002 1	0.020 3	0.047 6	0.047 4

注:***、**、*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给出了经过 white-robust 调整的标准误。

继续关注第(3)列中控制变量的系数。变量 *itindex* 的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信息化水平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信息化有助于企业事前获得市场需求信息,并在事后有效应对市场需求冲击,进而对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积极效应。变量 *govshare*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持股比例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可能源于:地方政府为实现稳就业、促增长的目标,会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导致企业盲目扩张产能,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变量 *export*、*edupro* 的系数都为正但不显著,这与干春晖等^[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变量 *rdact* 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表明开展研发活动未能直接影响企业产能利用效率。变量 *fixasset*、*size*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

资本密集度越高、规模越大的企业越能够有效利用潜在产能,这类企业有丰富的经验和足够的资源应对市场需求冲击,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并有效利用潜在产能。另外,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中 *capital*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处于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往往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城市作为当地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较好的软硬件环境,进而减少企业产能过剩的风险。*surplus*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政盈余水平越高的城市,企业产能利用率越低。这可能源于这类城市政府拥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干预企业正常投资决策,引发了企业产能过剩问题。

考虑到变量 *fixasset* 存在较多缺失值,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控制变量 *fixasset* 剔除,进一步估计方程(1),对应结果报告在表3第(4)列。可以看出,变量 *gerr*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说明政企关系重构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控制变量的系数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本文还使用 *utilevel* 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表3第(5)列至第(8)列结果显示,政企关系重构依然会显著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前述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二) 不同规模企业比较

本节比较政企关系重构对不同规模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首先,我们根据世界银行调查问卷对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将100人以上的企业视为大型企业,将其他企业视为中小型企业,并据此生成二元虚拟变量 *large*。表4第(1)列报告了加入交叉项 *gerr* × *large* 之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 *gerr* 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交叉项 *gerr* × *large*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企关系重构对大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更小,这与前文假说2a理论预期一致。为

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将企业员工总数三等分,得到虚拟变量 *size_dum*,取值为0到2之间的离散整数。表4第(2)列报告了加入交叉项 *gerr* × *size_dum* 之后的回归结果,变量 *gerr*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交叉项 *gerr* × *size_dum* 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政企关系重构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对于大企业而言更弱,依然符合假说2a理论预期。我们还进一步使用 *utilevel* 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利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展开估计,表4第(3)列和第(4)列结果表明,前述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五、拓展性研究

(一) 影响机制检验

既然政企关系重构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那么这一影响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一个合理的推论为:若政企关系重构通过增加政企信息不对称而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那么,随着政企信息不对称的降低,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效应会减弱。本文通过考察如下两类因素的调节效应,检验政企关系重构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机制:

第一,企业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水平越高的企业越能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收集分析政策信息,预测政策未来走向,降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以预期,对于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而言,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效应较弱。表5第(1)列结果表明,变量 *gerr* 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交叉项 *gerr* × *iiindex* 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证实了上述推

表4 政企关系重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不同规模企业比较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utirate</i> : Tobit 边际		被解释变量 <i>utilevel</i> : Ordered Probit	
	(1)	(2)	(3)	(4)
<i>gerr</i>	-7.270 9*** (1.486 1)	-7.992 6*** (1.495 8)	-1.221 7*** (0.221 5)	-1.223 3*** (0.209 7)
<i>gerr</i> × <i>large</i>	6.703 1*** (1.741 9)		1.195 3*** (0.294 3)	
<i>gerr</i> × <i>size_dum</i>		4.090 8*** (0.991 1)		0.608 5*** (0.140 2)
<i>large</i>	-2.167 0** (0.923 7)		-0.305 5* (0.170 7)	
<i>size</i>	0.385 0 (0.306 1)	-0.335 9 (0.276 4)	0.007 3 (0.046 9)	-0.071 9 (0.045 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 175	1 175	1 175	1 175
Pseudo R ²	0.010 5	0.011 2	0.059 0	0.058 5

注:***、**、*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给出了经过 white-robust 调整的标准误。

论,即加剧政企信息不对称的确是政企关系重构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机制。

第二 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构建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同样有助于降低政企信息不对称。在信息公开背景下,企业能够合理预期政府行为和政策走向,准确评估政府介入市场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同时,信息公开制度还能有效约束政府“自由裁量权”,减少政府干预带给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27]。本文首先利用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得分 *citytrans* 衡量信息公开水平,该项数据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表 5 影响机制检验: 政企信息不对称的调节作用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utirate</i> : Tobit 边际			被解释变量 <i>utilevel</i> : Ordered Probit		
	(1)	(2)	(3)	(4)	(5)	(6)
<i>gerr</i>	-9.407 7*** (2.575 9)	-16.274 4*** (4.424 6)	-36.835 5*** (12.525 1)	-1.523 6*** (0.396 5)	-3.442 5*** (0.724 5)	-7.802 9*** (1.614 8)
<i>gerr</i> × <i>itindex</i>	1.740 5** (0.726 9)			0.289 1** (0.119 2)		
<i>gerr</i> × <i>citytrans</i>		3.426 6*** (1.065 9)			0.799 6*** (0.177 5)	
<i>citytrans</i>		-1.134 6** (0.521 0)			-0.216 5** (0.101 2)	
<i>gerr</i> × <i>protrans</i>			0.591 5*** (0.216 0)			0.129 3*** (0.028 2)
<i>protrans</i>			-0.097 8 (0.073 7)			-0.024 7** (0.011 6)
<i>itindex</i>	-0.121 1 (0.305 5)	0.873 8*** (0.269 7)	0.411 8 (0.255 0)	-0.016 0 (0.059 4)	0.146 0*** (0.041 7)	0.070 4* (0.039 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 175	1 032	1 175	1 175	1 032	1 175
Pseudo R ²	0.009 6	0.011 0	0.011 0	0.051 1	0.077 2	0.069 2

注: ***、**、*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给出了经过 white-robust 调整的标准误。

学院发布的《2012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⑦。表 5 第(2)列结果显示,变量 *gerr*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交叉项 *gerr*×*citytrans*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财政透明度提升会弱化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本文还使用省级政府透明度得分 *protrans* 测度信息公开水平,该项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12)》^⑧。表 5 第(3)列结果显示,变量 *gerr*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交叉项 *gerr*×*protrans*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省级政府透明度提升会减弱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效应。上述结果说明,政企关系重构会通过增加政企信息不对称而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

表 5 第(4)列至第(6)列报告了使用 *utilevel*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 Ordered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前述结论依然成立,即较高的企业信息化程度和政府信息公开水平会弱化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向影响。

(二) 竞争性机制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政企关系重构还可能通过政府干预机制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在地方竞争格局下,地方官员出于政绩诉求可能会扭曲正常的市场配置机制,人为压低生产性资源价格,刺激企业盲目扩大产能和过度投资,导致行业重复建设和企业产能过剩^[6]。地方政府人事变更将有可能加剧政府干预动机,因为,新任地方官员追求在短期内做出政绩,会在上任伊始便采取经济刺激政策,进而引发辖区内企业的产能扩张。徐业坤和马光源^[12]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官员变更带来的政绩压力会加剧辖区内企业的产能过剩。从企业角度而言,面对地方政府人事变更带来的政企关系重构格局,企业有较强的动机扩大投资和产能,以迎合新任地方官员的政绩诉求,这有助于赢得新任地方官员的信任和好感,进而在未来政策资源分配中赢得优势^[28]。

综合上述分析,若政企关系重构通过强化政府干预效应而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那么这一影响会随着政府干预加强而增大。本文使用政府持股比例 *govshare*、高管每周应对政府监管要求花费的时间比重 *regu*、营业执照和许可给企业运行造成的障碍程度 *regula* 三个指标衡量企业面临的政府干预程度。当营业执照和许可带来的障碍程度为“无障碍”“较小障碍”“中等障碍”“较大障碍”“非常严重的障碍”时,变量 *regula* 对应赋值为 0 到 4 之间的离散整数。不难判断,政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应对政府监管花费的时间越多,营业执照和许可带来的障碍越大,意味着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越

多。表6前三列结果表明,变量 *gerr*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交叉项 *gerr* × *govshare*、*gerr* × *regu*、*gerr* × *regula* 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政府持股比例并未对政企关系重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本文进一步使用 *utilevel* 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表6第(4)列至第(6)列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并未调节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向影响。

(三)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前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按照如下思路展开稳健性检验^⑨:第一,变换关键解释变

量。我们使用市委书记更替次数 *gtfre_sj* 测度政企关系重构指标,重复前文实证过程。结果表明,前述结论依然成立,即政企关系重构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且这一效应对于大企业而言更弱。同时,当样本企业面临的政企信息不对称现象越严重时,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向影响越强。另外,我们还使用市长更替次数 *gtfre_sz* 测度政企关系重构指标,重新评估其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证实前述主要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剔除2006年及之后成立的样本企业。本文构建的政企关系重构指标关注2006—2010年间的官员更替状况,理论上,只有那些2006年之前成立的企业才能充分利用这五年的地方政府人事变更信息信息进行决策。本文剔除2006年及之后成立的样本企业,重新评估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政企关系重构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且这一效应对于大企业而言更弱;当企业面临的政企信息不对称现象越严重时,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效应越强。第三,剔除两个直辖市的样本企业。样本企业所涉及的25个城市中,上海、北京作为直辖市,其主政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晋升激励与其他城市主政官员明显不同,我们进一步剔除这两个城市的样本企业,重新考察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前文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六、结论

产能过剩是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痼疾,而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前提。本文立足于政企信息不对称视角,考察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具有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政企关系重构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但这一效应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更弱。机制检验表明,当企业信息化水平和政府信息公开水平越高时,政企关系重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越弱,然而,政府持股比例、高管应对政府监管花费的时间、营业许可带来的障碍等因素并未影响政企关系重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上述结果意味着,加剧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政企关系重构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机制。

本文拓展了政企关系影响企业行为的实证文献,并具有重要的政策内涵。随着任期限制、异地交流、挂职锻炼等干部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地方主政官员变更成为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现象,由此会带来政企关系重构。在此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应立足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一目标,构建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推进信息公开实践的制度化 and 主动性,建立稳定有效的

表6 政企关系重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utirate</i> : Tobit 边际			被解释变量 <i>utilevel</i> : Ordered Probit		
	(1)	(2)	(3)	(4)	(5)	(6)
<i>gerr</i>	-4.018 1*** (1.128 5)	-3.930 3*** (1.331 2)	-4.411 6*** (1.267 9)	-0.618 7*** (0.174 3)	-0.688 7*** (0.179 5)	-0.743 9*** (0.187 1)
<i>gerr</i> × <i>govshare</i>	0.009 9 (0.027 4)			-0.002 1 (0.004 9)		
<i>gerr</i> × <i>regu</i>		-0.215 0 (0.869 6)			-0.015 8 (0.085 7)	
<i>regu</i>		-0.101 8 (0.399 4)			-0.023 1 (0.052 7)	
<i>gerr</i> × <i>regula</i>			0.753 2 (1.365 9)			0.138 5 (0.327 4)
<i>regula</i>			0.922 4 (0.566 4)			0.284 3 (0.177 4)
<i>govshare</i>	-0.028 1 (0.017 5)	-0.021 6* (0.012 7)	-0.022 0* (0.012 7)	-0.002 6 (0.002 9)	-0.003 1* (0.001 8)	-0.003 2* (0.001 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 175	1 146	1 174	1 175	1 146	1 174
Pseudo R ²	0.009 1	0.010 3	0.010 0	0.047 7	0.054 5	0.061 2

注:***、**、*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给出了经过 white-robust 调整的标准误。

政企沟通机制。同时,地方官员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有效避免“新官不理旧政”的问题,保持政策一致性和连续性。此外,企业应推进自身信息化建设,提高对市场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分析研判能力。上述举措无疑会大大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从而为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微观基础。

注释:

- ①需要说明的是,政府为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实施产业政策扶持特定企业发展,但政府难以全面了解异质性企业真实的发展前景、创新能力以及社会目标承担情况,在甄别、选择目标企业时同样处于信息劣势,这也会引发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17-19]。本文主要关注政企关系重构加剧政企信息不对称,使企业难以有效应对市场冲击和政策冲击,因此,更强调企业所面临的信息劣势。
- ②本文对地方主政官员更替定义如下:当地方官员实际更替发生在1月至6月时,视为当年发生官员更替;当地方官员实际更替发生在7月至12月时,视为下一年发生官员更替。由于问卷询问的是企业调查年份上一年(即2011年)的产能利用率,以2011年为基准前置五年便是2006—2010年。
- ③变量 *itindex* 按照如下方法构造:受访企业需要回答信息沟通技术在合作伙伴关系、产品和服务改善、产品和运营、营销和销售、顾客关系5个环节的支持程度,选项依次是“从不”“较少”“有时”“经常”“总是”,对应赋值1、2、3、4、5,我们取5个指标得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变量 *itindex* 的取值。
- ④我们还从产出视角描述企业研发活动,构建新变量 *newpro*,当过去三年企业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时,变量 *newpro* 赋值为1,否则 *newpro* 赋值为0。在方程(1)中引入控制变量 *newpro* 重复全文实证过程,结果依然表明研发活动 *newpro* 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无显著影响,而政企关系重构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
- ⑤固定资产总额等于企业2011年底“机械、车辆、设备、土地、建筑”等资产账面净值之和。
- ⑥限于篇幅,相关分析具体结果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 ⑦该报告评估了中国81个城市2011年的财政透明度,评估内容包括政府的结构和职能、政府与其他公共部门关系图、2011年预算内财务报告、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八项指标得分状况。每项指标满分为1分,8项指标得分加总便是城市财政透明度得分。由于该评估没有提供东莞、南通两个城市的财政透明度得分,该部分回归样本数会减少。资料来源:俞乔,乔誌东.哪个城市更透明—81个城市财政透明度大排名[EB/OL].(2012-6-11).
http://paper.people.com.cn/zgjzk/html/2012-06/11/content_1066034.htm?div=-1。
- ⑧该评估构建的省级政府透明度测评指标包含七个部分,分别是目录、政府公报、规范性文件、行政审批、环境保护、依申请公开和年度报告,这七个部分的分值依次是15分、5分、15分、15分、15分、25分、10分,因此,省级政府透明度总分是100分。
- ⑨为节约报告篇幅,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没有在文章正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 [1] DIXIT A. 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entry-deterrence [J]. *Economic journal*, 1980, 90(357): 95-106.
- [2] OGAWA H, NISHIMORI A. Do firms always choose excess capacity? [J]. *Economics bulletin*, 2004, 12(2): 1-7.
- [3] BLOOM N, BOND S, VAN REENEN J.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dynamic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 74(2): 391-415.
- [4] 林毅夫.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 [J]. *经济研究*, 2007(1): 126-131.
- [5] 林毅夫, 巫和懋, 邢亦青. “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J]. *经济研究*, 2010(10): 4-19.
- [6] 江飞涛, 耿强, 吕大国, 等. 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6): 44-56.
- [7] 干春晖, 邹俊, 王健. 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3): 44-56.
- [8] ZHANG Y, ZHANG M, LIU Y, et al. Enterprise investment,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oal overcapacity: the case of China [J]. *Energy policy*, 2017, 101: 162-169.
- [9] CHEN S, SUN Z, TANG S, et 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2): 259-271.

- [10]席鹏辉,梁若冰,谢贞发,等.财政压力、产能过剩与供给侧改革[J].经济研究,2017(9):86-102.
- [11]包群,唐诗,刘碧.地方竞争、主导产业雷同与国内产能过剩[J].世界经济,2017(10):144-169.
- [12]徐业坤,马光源.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产能过剩[J].经济研究,2019(5):129-145.
- [13]范林凯,李晓萍,应珊珊.渐进式改革背景下产能过剩的现实基础与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5(1):19-31.
- [14]周密,刘秉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经济学解释[J].经济研究,2017(2):67-81.
- [15]吴利学,刘诚.项目匹配与中国产能过剩[J].经济研究,2018(10):67-81.
- [16]吕艳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状况——基于政府透明度测评的实证分析[J].清华法学,2014(3):51-65.
- [17]王克敏,刘静,李晓溪.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J].管理世界,2017(3):113-124+145+188.
- [18]赵璨,王竹泉,杨德明,等.企业迎合行为与政府补贴绩效研究——基于企业不同盈利状况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5(7):130-145.
- [19]程仲鸣,张鹏.财税激励政策、政府质量与企业技术创新[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3):53-64.
- [20]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3(5):116-130.
- [21]曹伟,杨德明,赵璨,等.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周期——基于政企关系重构的动态研究[J].财经研究,2017(1):4-16.
- [22]张龙鹏,蒋为.政企关系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J].产业经济研究,2015(6):82-90.
- [23]王永进,匡霞,邵文波.信息化、企业柔性产能利用率[J].世界经济,2017(1):67-90.
- [24]韩国高,胡文明.要素价格扭曲如何影响了我国工业产能过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7(2):49-61.
- [25]于文超.政企关系重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J].经济评论,2019(1):33-45.
- [26]ZHU J,ZHANG D.Does corruption hinder private businesse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predictable corruption in China [J].Governance,2017,30(3):343-363.
- [27]邓淑莲,朱颖.财政透明度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基于“主观”与“被动”投资偏误的视角[J].财经研究,2017(5):4-17.
- [28]陈艳艳,罗党论.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投资[J].经济研究,2012(S2):18-30.

(责任编辑:李敏)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 government-enterpris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YU Wenchao¹ , WANG Xiaoda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 Chongqing 401120 , China;

2. China Academy of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Beijing 100081 ,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the economy , enterprises are at an information disadvantage in predicting the market operation trend and policy change trend , which leads to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e change of local government personnel will reshap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situation , leading to the failure of the origin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 and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GERR) will aggravat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2012 ,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GERR on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The study finds

that GERR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and this impact is less prominent for large-scale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effect of GERR on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will be less prominent, while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ails to produce a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R and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The abov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 tests. The conclusions not only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stitutional inducements of China's overcapacity, but also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consolidating the micro-foundation of quality reform and efficiency reform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government-enterprise information asymmetry;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usiness environment; changes of government personnel

(上接第 86 页)

Management background and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HAN Jiejun¹, ZHENG Lekai^{2,3}, SU Hui⁴

(1.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Shanghai Gold Exchange, Shanghai 200001, China; 4.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has occupied the mainstream of global trad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ystem of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manag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By merging the database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database of customs, this study calculates the overseas value-added rate of export products of enterprises, studies how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overseas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flue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of enterprises respectively, and what kind of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influe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of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 of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and influence channels of the three management backgrounds on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vis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increase of Management R&D and design and other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has increased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ts influence channel is to increase the impor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R&D technology, which is very beneficial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Overseas background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which has no significant and clear impact on R&D and intermediate import, and has uncertainty 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enterprises;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reduce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intermediate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weakening of exiting global value chain and "Learning by Importing" on enterprises is negative.

Key words: management background; global value chain; intermediate import; enterprise R&D; learning by importing; listed company